

## 新冠疫情下东南亚区域机制化合作新进程探究

丁 莉 熊栎天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为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东南亚国家携起手来，团结协作共同抗疫，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造成的“东亚悲剧”阴影对东亚区域仍产生消极影响，但东南亚国家能够超越发达国家主导的“新区域主义”，积极推行“开放区域主义”的合作理念。运用超越“雁形模式”的“平轴模式”概念，可以更好地解析东亚国家强化区域认同，加强互信互助，推动联合抗击疫情的制度化区域合作进程。而泛东亚的“胡桃模式”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东盟+中日韩”合作内核机制及其与区域外重要国家协调的外壳机制构成的双层跨区域合作的复合型框架的建构。在共同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中美两国应建构一种“双核模式”，以防止滑向冲突，积极地相向而行，共同管理好太平洋这台巨型电脑。新冠疫情中的种种乱象预示着西方主导的平面全球化行将终结，东南亚以及东北亚区域的机制化合作将有助于加强亚洲各区域的聚合，促进世界形成区域间相互连接与合作的立体性网络化全球社会。

**关键词：**开放区域主义；东南亚合作机制；泛东亚双层构架；全球区域间合作网络；东亚整合

**收稿日期：**2021-04-20

**作者简介：**丁莉（197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英语教育、跨文化研究；熊栎天（1993~），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全球能源互联网集团有限公司）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国家安全、区域合作与能源发展战略。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交思想的历史逻辑与文明基础”（项目编号：18KDAL039）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面对疫情，东南亚国家携起手来，及时采取相互协调与联动合作的抗疫行动，有效防止了疫情在区

域内恶性扩散。疫情之后的世界局势将会扑朔迷离，但可以肯定的是东南亚的整合将会加强，机制化合作的程度将得到提升，并将对新的全球化进程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对这一系列连带关系的把握，苏浩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东亚整合的艰难之路：平轴、胡桃、双核模式的建构》（下文简称《东亚整合》）的研究逻辑和分析框架，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启示和案例分析。本文将结合对这本著作的学理评析，对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东亚国家推动的制度化合作安排进行分析，再解析与此相关的泛东亚双层协调体制，进而探讨东亚与亚洲和全球区域间协调与合作关系的建构。我们会看到疫情后东盟引领下的东亚区域一体化将启动新的进程，并将推动亚洲不同区域的联动性整合，进而有利于基于全球治理的一种网络化世界的建构。

### 一、强化东南亚认同并提升“开放区域主义”价值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盟引领下的东亚区域的官方机制化合作启动以来，东南亚国家一直在努力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并将建构东南亚与东北亚所聚合的东亚经济共同体作为区域合作的目标确定下来。二十多年来，东南亚次区域合作在实现整合的道路上逐渐深化。而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采取逆全球化行为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特别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的追求，使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区域面临被撕裂的风险。东南亚国家应该强化区域认同，在“开放区域主义”理念指导下进一步推进东亚区域的整合。

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在东亚和全球的流行，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只有强化区域归属的认同和秉持区域合作理念，才能最好地实现自身利益。由于东亚国家间地缘相互接近、人员交流密集、产业贸易联通，疫情来临之时中国封城封省、举国禁足，按下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暂停键，国家间人员往来戛然终止，物流迅速减少，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的东亚社会经济受到了重创。<sup>①</sup> 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东南亚国家面前：东南亚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还能持续推进吗？

在此危难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取消了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与东亚国家的人员交流也大大缩小。甚至发出“亚洲病夫”的歧视性鼓噪，<sup>②</sup>还要求其产业回流美国。一贯声称自己是太平洋区域领导者的美国，面对东亚区域的困境，不

---

<sup>①</sup> Amy Searight, “The Economic Toll of Covid-19 on Southeast Asia: Recession Looms as Growth Prospects Dim”, <https://www.csis.org/analysis/economic-toll-covid-19-southeast-asia-recession-looms-growth-prospects-dim>; Miyeon Oh, “Coronavirus could bring the United States’ East Asian allies closer to Beijing”, <https://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coronavirus-could-bring-the-united-states-east-asian-allies-closer-to-beijing/>.

<sup>②</sup> Walter Russell Mead,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3, 2020.

但没有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随后当美国疫情严重而自身抗疫不力之时，却试图将疫情暴发的责任“甩锅”给中国，甚至制造所谓“中国承担责任论”以逃脱美国国内应对疫情不力的质问。<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国家的舆论也对美国污名化中国的行为一唱一和，群起围攻中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无端指责，并试图挑动对中国的产业“脱钩”而割裂东南亚经济体间的紧密经济联结，这些鼓噪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正是近代东亚屈辱历史印记的再次显现。

《东亚整合》一书提出的“东亚悲剧”概念，认为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扩张到东亚区域，打破了东亚两千年来的传统区域秩序，通过“血与火”的侵略扩张和征服统治，建构起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安全秩序。这是一种西方人杀戮东亚人、西方民族统治东亚民族、西方政府管理和支配东亚事务、西方行为方式决定东亚秩序的形成、西方价值观决定东亚人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标准的历史颠覆，其结果是东亚区域正常的传统历史逻辑被强力改变，造成东亚国际社会的巨大变异。而“脱亚入欧”的军国主义日本也秉持西方强权政治逻辑，肆意地在东亚侵略扩张。整个东亚区域陷入了一种崩溃的、被奴役的、对抗的和撕裂的悲惨境地。<sup>②</sup>即使二战结束后东亚国家取得了独立，殖民统治残余也在世纪之末彻底结束（香港、澳门回归中国），但“‘东亚悲剧’的消极逻辑仍在不时地运转”，突出体现在域外西方国家仍试图在东亚区域发挥主导作用，亚洲国家和人民不能主导自己的事务，西方的代表者美国仍公然宣称要在亚洲持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sup>③</sup>这说明“东亚悲剧的阴影”仍对东南亚国家有着巨大负面影响，使其难以完全独立自主地处理自身事务。我们应强调历史已进入21世纪，东南亚国家需要走出“东亚悲剧”的阴影，明确作为“东亚人”的身份认同，保持整体的东亚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协调一致，夯实东南亚与东北亚经济利益的共享基础，坚持东亚整体安全的共同追求，把因西方列强入侵和西方霸权介入而变异的东亚，带回应有的正常历史轨道上，最终实现东亚的事务由东亚国家做主，在互惠互利基础

---

① “GOP memo urges anti-China assault over coronavirus”, *Politico*, April 24, 2020,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4/24/gop-memo-anti-china-coronavirus-207244>; 张海冰：《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与路径选择》，《当代世界》，2020年第5期，第5~6页。

② 苏浩：《东亚整合的艰难之路：“平轴”——“胡桃”——“双核”模式的建构》，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30~33页。

③ Kenneth Lieberthal, “America is going to play a leadership role in Asia for decades to come”,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2011; 《美国致力于在亚洲扮演领导者的角色》，《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3月21日，[https://www.guancha.cn/Neighbors/2012\\_03\\_21\\_67509.shtml](https://www.guancha.cn/Neighbors/2012_03_21_67509.shtml); 特朗普执政后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强调美国是“世界领导者”（U.S. Leadership in the World），自然也将领导亚洲。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7）》，“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Era”，<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

上共同努力并相互协调地建构合理、公正、健康的东亚社会，使东南亚与东北亚所聚合成的东亚区域真正成为一个东亚人民生命相连、利益与共、相互协作的命运共同体。<sup>①</sup>

值得庆幸的是，新冠疫情暴发时东亚国家和人民并未受到西方国家挑动对立的噪音干扰，而是相互携起手来，积极开展了相互间无私而真诚的援助，共同努力抗击疫情。<sup>②</sup>当中国遭受新冠肺炎的磨难时，韩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巴基斯坦等东亚国家立即伸出了援助之手，向中国疫区捐款捐物，给艰难抗疫的中国人民以莫大的温暖和坚定的支持。而当中国控制住了国内的疫情，恢复了生产力，疫情在东亚其他国家肆虐的时候，中国则成为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最多协助的国家。<sup>③</sup>通过东亚国家间这种特有的情感交流和真诚的互助合作，我们看清了谁才是真心相助、命运与共的朋友和兄弟。过去推动东亚合作时往往聚焦于“经济合作为主旋律”，而忽略了“隐性的”安全议题。<sup>④</sup>这次东亚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合作抗疫行动，从实践上补充了这种缺失。这些以诚相待和相互支持的抗疫言行，增进了东南亚与东北亚国家间的互信互助的关系，也加强了大家的东亚区域性认同，这将给下一步的东亚区域机制性合作注入新的动力。<sup>⑤</sup>

东南亚国家与东北亚国家间的整体东亚区域性机制化合作进程的推进，需要有理论的指导。《东亚整合》一书明确指出，“开放区域主义”已成为东亚各国普遍采用的引领区域合作的战略理论概念。作者认为指导区域合作的理论曾经历三个发展阶段。源自欧洲的“传统区域主义”开创了二战结束后的欧洲区域合作一体化的样式，带有区域的统一性和制度的单一性特点。冷战结束后的“新区域主义”突破了欧洲模式，推动形成了亚太跨区域性的合作方式，典型案例就是美国主导的“亚太经合组织”（1989年）的建立。<sup>⑥</sup>西方发达国家以自身的政治、安全和经济优势，通过与东亚发展中国家进行跨区域性制度联结，在安全和经济

---

① 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求是》，2020年第8期，第4~20页。

② Prashanth Parameswaran,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s Coronavirus Challenge”, *The Diplomat*, April 08,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whats-next-for-us-asean-cooperation-amid-the-global-coronavirus-pandemic/>.

③ 《疫情下，中国是提供东南亚最多协助的国家》，《新加坡眼》，2021年2月11日，<https://www.yan.sg/dongnayguojiaxiezhu/>。

④ Bowles Paul,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Global Capitalism Revisited”, *Pacific Affairs*, Vol. 92, No. 3, 2019, p.543.

⑤ 张云：《知识—认知共同体与东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中日合作的必要与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3期，第63~71页。

⑥ Norma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Massachusetts: Lexington Books, 1991, pp. 1~5; Byeong-hae Sohn, “Towards A New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Vol. 19, No. 3, 2004, pp.499-518.

领域直接介入东亚区域。<sup>①</sup>“新区域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本质上却是发达国家深度介入发展中区域的一种理论和政策工具，而东亚区域实际是美国为实现自身利益而介入的重要地缘方向。在美国霸权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东亚区域权力结构逐渐从垂直体制转变为水平结构，为此美国需要建立政府间合作机制并从中发挥杠杆作用。<sup>②</sup>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东亚悲剧”阴影的一种体现。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东南亚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简单接受这一理念并采取行动与之配合，则将会陷入西方主导的“新区域主义”的理论陷阱和政策误区，将自己的行为方式与美国的利益取向不自觉地结合在一起。<sup>③</sup>对于“新区域主义”的理论认知，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或者说仍存在着学术上的混淆。东南亚国家鉴于199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开始推动真正的区域内合作进程，形成了具有“对外开放性”和“对内包容性”的“开放区域主义”新理念，实现了对“新区域主义”的超越。<sup>④</sup>书中通过对以上两者关系的厘清，改变了学术界一般的分类方式，凸显了“开放区域主义”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指导作用，是对区域主义理论研究的突破。

笔者认为，东南亚国家所秉持的“开放区域主义”，不仅可以指导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东亚国家通过深度协调与合作，最终实现区域一体化的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并且对世界其他区域开展区域性、跨区域和区域间合作具有很好的实践示范意义。全世界无论是发达区域还是发展中区域，首先都需要一种区域的回归和认同，推进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同时又向外开放，将本区域与域外大国及其他区域连接起来，实现跨区域和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因此，东盟引领下的东亚“开放区域主义”可以作为未来全球性的区域间合作网络化建构的一种理论样板。

## 二、深化东南亚国家引领的东亚区域机制化合作程度

新冠肺炎在东亚暴发初期，中国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受害国，曾一度按下了经济建设的暂停键，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与世界其

---

<sup>①</sup> 苏浩：《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45页。

<sup>②</sup> Crone Donald, “Does Hegemony Mat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acific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4, 1993, pp. 501 ~ 525.

<sup>③</sup> 苏浩：《东亚整合的艰难之路》，第75页；Ellen L. Frost, *Asia's New Regionalism*, London, UK: Lynner Rienner Publishers, 2008, pp. 2 ~ 4.

<sup>④</sup> 苏浩：《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第46页；Harvie, Charles, and Hyun-Hoon Lee, “New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How Does It Relate to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19, No. 2, 2002, pp.123 ~ 140.

他区域间的交通运输和经济关系也遭到冻结，世界经济陷于一片萧条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两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一是全球缺乏集体合作抗疫行动。疫情在世界肆虐时国际社会虽然在2020年3月份召开过几次多边会议，如“G7”西方国家首脑视频会议、“G20”首脑视频会议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视频会议，讨论了抗击疫情问题，却都没能出台联合抗疫的有效措施。<sup>①</sup>二是美国挑起甩锅追责行为。发达国家虽自顾不暇，美国仍试图带头开展所谓独立调查病毒源头以追责中国，白宫还出台全面压制中国的战略报告，<sup>②</sup>甚至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严重搅乱了国际社会携手抗疫的合作氛围。<sup>③</sup>环顾世界各区域，疫情期间唯有东亚国家在区域合作机制的框架下，采取了多边的实际集体行动，真正携起手来合作抗疫。<sup>④</sup>

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的进程已经进行了多年，虽存在一些内外挑战，但一直能够向前推进。《东亚整合》一书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解析，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历史进程的画卷。在东盟引领下的东亚区域整合是一个“四轮驱动”的机制化协调进程。<sup>⑤</sup>其中的“东盟+中日韩”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是东亚的一个创举，成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政府间合作的平台。各国领导人已明确将建构“东亚经济共同体”作为合作的目标，并规定了这一理想的内涵和实现的路径。而相继建立的十多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则在具体领域将区域合作向纵深推进。东亚合作进程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之间的三个“10+1”合作框架，其中东盟与中国的合作最具有效率。中国与东盟间曾进行了“黄金十年”的全面合作，目前正在进行“钻石十年”的高质量深入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为北上经济融入中国而提出了“Y”型构想（两廊一圈：从南中国海出发，与中国的沿海和内陆相衔接），中国则为南下承接东盟而形成了“M”型设计（一轴两翼：以道路联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与湄公河所连接的大陆东盟和南中国海为

<sup>①</sup> 于洪君：《联合抗“疫”：从全球合作到携手共治》，《人民论坛》，2020年第10期，第7页。

<sup>②</sup> “U.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united-state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sup>③</sup> Orville Schell, “The Ugly End of Chimerica”，<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4/03/chimerica-ugly-end-coronavirus-china-us-trade-relations/>; K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The Coronavirus Could Reshape Global Order”，<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3-18/coronavirus-could-reshape-global-order>。

<sup>④</sup> 马晓伟：《深化抗击疫情国际合作 共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智慧中国》，2020年第5期，第13~16页；Prashanth Parameswaran, “What’s Next for US-ASEAN Cooperation Amid the Global Coronavirus Pandemic?”，<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whats-next-for-us-asean-cooperation-amid-the-global-coronavirus-pandemic/>。

<sup>⑤</sup> 张蕴岭，沈铭辉主编：《东亚、亚太区域合作模式与利益博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平台的海洋东盟全面结合)，<sup>①</sup>使得双方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战略对接。<sup>②</sup>而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间官方合作框架的搭建也已经起步，尽管其间有过曲折和停顿，但近三年来的互动与协调的势头又再次得到加强。<sup>③</sup>此外，中国与大陆东盟间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实效十分明显，特别是“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的建立使得这一次区域合作得到了升华。<sup>④</sup>显然，在整个东亚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多层面的次区域和区域性网络化的多边合作框架和机制，未来需要做的是，将这些合作进行进一步机制化升华，最终形成稳定而完整的区域性体系。

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看，东亚经济体间的合作样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亚整合》一书创新性地提出了“平轴模式”的理论概念，为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综合考察分析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框架。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用日本学者提出的“雁形模式”作为认知东亚经济发展的基本范式。<sup>⑤</sup>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雁形模式”已经式微，以至2001年5月日本通商省发表的《通商白皮书》认为，东亚经济发展已从原来的“雁阵”向新的形态转变。<sup>⑥</sup>有的西方学者将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界定为经济等级制度和经济关系不稳定阶段，并认为这是一种日本和中国关于区域间生产综合体的竞争。<sup>⑦</sup>显然，国际学术界仍总体停留在“雁行模式”的记忆中，并未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概念来认知东亚经济整合的超越式发展样式。而“平轴模式”的概念则以直观的图形描绘和逻辑自洽的学理分析，很有说服力地向我们解析了以区域供应链和产业链为基础建构的

---

① 赵明兴：《浅谈“一轴两翼”与“一廊一圈”》，《东南亚纵横》2007年第5期，第2~4页；孙金诚：《中越构建“两廊一圈”与中国—东盟“一轴两翼”的关系》，《东南亚纵横》，2007年第5期，第5~7页；蔡道利：《“两廊一圈”与“一轴两翼”相辅相成》，《创新》，2007年第3期，第125页；周英虎：《“M”型战略选择与广西在湄公河次经济区发展中的对策》，《创新》，2007年第1期，第61~65页。这些论文所分析的“两廊一圈”和“一轴两翼”的概念更多的是用来分析中国广西与越南间的合作构想。笔者则将这两个概念加以扩展，用以界定中国与东盟间的宏观合作进程。

② 杨悦：《“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与东盟合作：东盟视角》，《中国—东盟研究》，2018年第3期，第181~184页；田云青：《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新时代》，《改革与开放》，2019年第21期，第1~3页。

③ 庞中鹏：《中日韩合作机制特点、机遇与挑战及其走向的分析》，《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5期，第30~36页；张蕴岭：《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困境、空间与问题》，《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4期，第10~15页；姜跃春：《中日韩合作的新机遇》，《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2期，第3~10页。

④ 李晨阳：《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遇、挑战与对策》，《学术探索》，2016年第1期，第22页。

⑤ 张雨：《从雁形模式到“10+3”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5期，第15~17页。

⑥ 日本经济产业省编：《通商白皮书》（2001），日本行政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⑦ Andrew MacIntyre and Barry Naughton, “The Decline of a Japan-Led Model of the East Asian Economy”, Pempel, T. J., *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77.

东亚“世界工厂”的图景，界定了未来共生共存的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样式。<sup>①</sup>当然，笔者认为这一理论概念建构的内在学理逻辑和要素关联的研究，还需要再进一步深化，希望学术界对这一有创意的概念展开讨论，使之更加完善。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东盟引领下的东亚合作程度正在得到提升，也显现了“平轴模式”所具有的解释力。当疫情在中国肆虐时，“东盟+中日韩”机制便开始启动。2020年2~4月举行了一系列“10+3”、“10+1”、中韩、中日韩的外长、卫生部长、疫情专家等各个级别的视频会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4月16日举行的“10+3”领导人视频会议，东亚国家领导人专门讨论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的重大问题。这是一次超常规的会议：首先“10+3”领导人会议按正常程序应在年底召开，这次则超常规地在4月召开；其次，这是东亚领导人第一次围绕着区域内共同面临的特定非传统安全问题召开的会议；再次，会议还发表了题为“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导人联合声明。过去23年的年度“10+3”领导人会议仅发表过三次确定未来东亚合作战略方向的联合声明，这次却是专门就特定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意义非同一般。

在这一联合声明中，东亚各国领导人认为“‘10+3’合作为东亚和平、安全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承诺将“建立统一战线”去应对所面临的共同威胁，并决心“加强团结、促进合作、相互支持，共同防控疫情，应对其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同时还提出了十八项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实质性地推动了东亚国家间紧密的机制性联手抗疫与经济合作。<sup>②</sup>联合声明突出体现了东亚国家的区域认同和团结一致的决心，不仅规定了东亚国家间有效防控疫情合作的路径，更设定了未来区域经济机制化合作的方向，这是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文件，<sup>③</sup>预示着东亚合作行为将走深走实，合作的机制化程度将得到提升。

很显然，东南亚国家在共同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通过召开一系列多边会议，强化了区域合作意识、提振了各国的合作信心、明确了制度性合作的路径。<sup>④</sup>疫情在世界各地暴发时，一些区域只能各自为政地忙于应对病毒疫情，甚至采取扣押他国医疗物资的相互拆台行为，国际社会也召开过“G20”和世界卫生大会等多边会议，却没有看到多国间能够联合采取实际的抗疫行动。只有“10+3”框架

---

<sup>①</sup> 苏浩：《东亚平轴合作模式异于欧美日模式》，《联合早报》，2018年11月29日；《东亚经济合作从“雁阵”变成“平轴”》，《环球时报》，2019年7月10日。

<sup>②</sup> 《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联合声明》，[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4/15/c\\_1125856102.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4/15/c_1125856102.htm)。

<sup>③</sup> 《苏浩：抗疫合作提升东亚区域整合进程》，《环球时报》，2020年4月20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446461377143936&wfr=spider&for=pc>。

<sup>④</sup> 《外交部：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达成三方面共识》，[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4/15/c\\_1125856056.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4/15/c_1125856056.htm)。

内的东亚国家能够率先采取区域性集体合作行动，互帮互助，协同作战，有效抑制了疫情的蔓延，为最终战胜疫情奠定了坚实的区域性基础。同时，东南亚国家已经开始为疫情过后的合作恢复经济发展，积极做好相互协作的准备。应该说，经过疫情的考验，东南亚国家更加珍惜区域认同价值，愿意采取更多机制化合作措施，如加强本币互换功能以稳定区域金融体系；恢复并深化东亚产业网络建设以巩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也将创造条件保证和提升自身在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地位，以应对全球产业链分散化本土化的消极趋势。<sup>①</sup>其实，美国试图推动的对华经济“脱钩”，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助于加强亚洲特别是东亚区域产业链的深度联结。<sup>②</sup>应该说“平轴模式”所体现的东亚社会建构和经济布局，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必然能够向前推进，区域合作的机制建设层次必将得到提升。

### 三、建构合理的以东盟为中心的跨区域合作构架

东盟引领下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面临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好东亚区域与亚太跨区域两者间的辩证性互动关系。东亚区域无论基于地缘的自然衔接还是历史的传统渊源，与南亚、南太平洋和大洋彼岸的北美洲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区域的一些大国都试图保持对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的深度参与。东南亚与东北亚国家需要进行一种泛东亚的制度性设计，以保证这些周边大国可以发挥促进东亚合作的正面作用，同时防止其产生阻碍区域整合的负面影响。

在处理上述区域与跨区域间的辩证关系时，有四重因素需要给予足够关注。一是域外大国的作用。美国、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等大国和中等强国一方面从历史传统和现实利益上，与东亚国家都保持着政治安全或经济社会的密切关系，是东亚区域能够保持持续发展的重要外部作用力。另一方面，作为域外国家，它们又担心被排斥在这一富有极大潜力与活力的区域之外，故又试图介入其中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阻力。二是域内一些国家的摇摆性。相对于中国和日本，东盟国家的综合国力要弱得多，它们往往担心受到中国和日本的主导甚至控制，更希望凝聚自身力量，建构一种以东盟为中心并由大国所环绕的双层框架。甚至日本对东亚合作的高度机制化建设也持谨慎态度，试图牵引域外国家进入东亚以发挥平衡作用。三是跨区域机制的交织。冷战结束以来

<sup>①</sup> 《财经智库发布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报告》，《财经》，2020年4月10日，<https://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20-04-10/doc-iirczymi5540502.shtml>；《张燕生：东亚生产网络将率先恢复，未来全球产业链趋势是分散化本土化》，《搜狐网》，2020年4月11日，[https://www.sohu.com/a/387028095\\_100160903](https://www.sohu.com/a/387028095_100160903)。

<sup>②</sup> David P. Goldman, “Who’s decoupling from whom? As US reevaluates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sian giant’s export data show increas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Asia Times*, May 11, 2020.

所形成的一些官方性亚太跨区域合作机制，如经济上的“亚太经合组织”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安全上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国防部长与对话伙伴国会议”，东亚成员与域外国家在这些组织中，存在着经济和安全事务的制度性关联。四是需要将美国作为单独的因素加以认识。如何界定这一大洋彼岸的大国在东亚的地位，东亚内大国能否与之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促使美国不要再延伸“东亚悲剧”的阴影来消极介入区域合作，而应以建设性角色积极正面地参与东亚合作进程。

鉴于以上因素，东亚国家在建构东亚合作机制时，虽有内在的区域性认同和制度性合作的需要，但并没有像欧盟一样地追求单一区域的一体化制度建设，而是在“开放区域主义”理论指导下，与地缘相邻的主要大国都保持着密切的协调关系，进而通过泛东亚的制度建设，将东亚国家和域外国家包容进去。这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核心区域与环绕跨区域结合的双层复合型构架，即东亚地缘板块内紧密相连的“10+3”国家合作的内核机制，与区域外重要国家相协调的外壳机制，二者有机联结的泛东亚复合机制。对此，《东亚整合》的作者设计了一个很有实践意义的“胡桃模式”概念，作出形象化的抽象描述。<sup>①</sup>这种泛东亚式的跨区域合作框架，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展开分析。

第一，“东亚峰会”的泛东亚跨区域合作机制。东亚合作机制建设进程中，由于中日间互信不足，东盟一些国家又担心被中日两国主导，于是引入域外大国发挥平衡作用便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而域外国家对东亚区域的传统联系和被排斥在外的忧虑，也使它们力图加入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因此，自2004年以来，“10+3”国家先邀请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之后又加上美国和俄罗斯，建立了“10+8”的“东亚峰会”机制，<sup>②</sup>使“特殊的东亚国家外在指向特性和域外国家对东亚区域的内在指向选择”两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泛东亚”式的以大国对话沟通与战略协调为功能的跨区域性合作平台。<sup>③</sup>但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虽曾高调参加峰会，但特朗普上任后明显不重视这一峰会，对跨区域多边合作持消极态度。特朗普改变了由总统参会的传统，2017年峰会前夕他便离开了

---

<sup>①</sup> 苏浩：《东亚整合的艰难之路》，第296～300页。

<sup>②</sup> 祁怀高：《国际制度变迁与东亚体系和平转型：一种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56～70页；田野：《东亚峰会扩容与地区合作机制的演化》，《国际观察》，2012年第2期，第41～48页。

<sup>③</sup> 苏浩：《东亚整合的艰难之路》，第275，299页。

会议主宾国，<sup>①</sup>后两年的峰会则分别让副总统和安全事务助理参会。在会上美国极力强调南海问题，试图搅乱东亚合作的气氛，峰会主席声明中也不得不写上所谓关注南海问题的内容，<sup>②</sup>使得“东亚峰会”在政治议题上发挥的作用似乎超过了对经济合作的贡献。<sup>③</sup>不过，“东亚峰会”所确定的促进东亚合作的战略协商平台的定位，并不会因为美国搅局而发生变化。新冠疫情期间，东亚国家可以继续利用这一战略平台，推动大国间的沟通与协调，在2020年11月召开的“东亚峰会”上形成的《东亚峰会领导人关于合作促进地区经济稳定增长的声明》等成果文件，对东亚国家的联合抗疫和恢复经济的合作行动给予积极的肯定和支持，相关域外大国则应就发挥积极协调作用作出正面响应。<sup>④</sup>

第二，泛东亚跨区域性高水平自贸区建设。东亚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存在着一个错位现象，即双边自贸协定数量在全球最多，却缺乏统一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2012年11月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自由贸易区协定签署国开始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至2019年11月，RCEP的15个成员国已就自贸协定文本和市场准入文本达成一致，印度因还有一些未决问题需要处理而有所保留，但也表示会继续与其他15方保持建设性合作。2020年4月的“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再次确认了达成协议的承诺。而在2020年11月的东盟系列峰会上该协议得到了正式签署。这将对现有的各个“10+1”自贸协定的集体升级，通过制定区域内统一的系统性经济合作规则，将建构以东亚为核心的跨区域性紧密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大平台。<sup>⑤</sup>当然，RCEP建成后，中国还可能以适当条件加入CPTPP，<sup>⑥</sup>实现一种联结南太平洋和东太平洋的泛东亚宏大自贸区构架建设，从而为东亚经济

<sup>①</sup> Steve Herman, “Trump, At Last Minute, Skips East Asia Summit”, <https://www.voanews.com/east-asia-pacific/trump-last-minute-skips-east-asia-summit>; Oliver Holmes, “Trump skips East Asia Summit on final day of 12-day tour”,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7/nov/14/donald-trump-skips-east-asia-summit-on-final-day-of-12-day-tour>.

<sup>②</sup>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搅局东亚合作成为个别国家的“标配”》，[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dyfhcas\\_682566/xgxw\\_682572/t1713147.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dyfhcas_682566/xgxw_682572/t1713147.shtml)；“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14th East Asia Summit”，<https://asean.org/chairmans-statement-14th-east-asia-summit/>。

<sup>③</sup> G.V.C. Naidu, “Regionalism in Asia-Pacific: Role of APT and EAS”, Eds. Sen, R & Majumdar, A. J. & Behera, B., *Conflicting Ident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20, p.44.

<sup>④</sup> 《李克强出席第15届东亚峰会》，[http://www.xinhuanet.com/2020-11/15/c\\_1126741080.htm](http://www.xinhuanet.com/2020-11/15/c_1126741080.htm)。

<sup>⑤</su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整体结束》，《经济日报》，2019年11月7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11/07/content\\_5449588.htm](http://www.gov.cn/xinwen/2019-11/07/content_5449588.htm)。

<sup>⑥</sup> 《中国外交进入新方位，可考虑加入TPP》，<http://www.ccg.org.cn/Event/View.aspx?Id=5861>；陈九霖：《权衡利弊，适时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华夏时报》，2019年11月18日，第31版。

发展注入巨大的动力，并使东亚经济体能够为持续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sup>①</sup>

第三，泛东亚的安全双层构架设计。冷战结束后的东亚区域安全局势错综复杂，成为东亚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的现实障碍。尽管在东盟的主导下亚太地区建立了一些跨区域性的安全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国防部长与对话伙伴国会议”的官方机制，但与聚焦东亚合作的“10+3”机制并没有交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东亚整合》一书提出了前瞻性的解决方案。作者为指导东亚安全合作提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整体安全”概念，强调区域内局部安全问题并不应该危害整个区域的整体安全的保障，亚太跨区域国家通过正在建构的“东盟安全共同体”和未来东北亚和平合作机制建设，形成一个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再通过大国间达成安全利益协调的“西太平洋和平公约”，最终搭建维护东亚长治久安的双层整体安全构架。<sup>②</sup>东亚安全与和平的持久维持，确实需要一种宏观而长远的战略性设计。

第四，东亚事务中的中美关系稳定。东亚区域的长久和平与发展局势的维持，取决于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稳定与否。新冠疫情对当前国际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中美两国本应该相互协调合作，共同抗击疫情。但美国却出于其自私的政治目的，推卸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肆意抹黑和攻击中国，甚至鼓动美国企业从中国撤资以切断美国与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联结，还想建构所谓孤立中国的“经济繁荣网络”和“可信赖的伙伴”联盟，<sup>③</sup>以阻止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的深化，维持美国对亚洲经济的主导。<sup>④</sup>这种逆全球化和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对抗性行为，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政治操作。中国对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一直持积极而正面的态度。《东亚整合》一书就提出一个稳定中美关系的理念——“双核模式”，试图以建设性的创意概念来界定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探讨消除中美滑向冲突险境的路径。借用计算机技术的双核理念来分析，冷战结束后美国试图以领导者的身份发挥“中央处理器”的作用，主宰整个亚太跨区域的事务，但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主导能力已经捉襟见肘，难以应付纷乱复杂的局

① 《全球最大自贸区诞生！RCEP正式签署，中日韩自贸区或将提速》，《21世纪经济报道》，2020年11月15日，<https://new.qq.com/omn/20201115/20201115A064XP00.html>。

② 苏浩：《“整体安全”概念与亚太安全合作》，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第二届香山论坛论文集：《国际安全合作与亚太安全》，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396页。

③ Clifford D. May, “An American-led ‘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 could be a good start to not relying on China”, *The Washington Times*, May 12, 2020.

④ Mie Ob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sian regionalism: institutional hedging in an uncertain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 8, No. 2, 2019, pp.125 ~ 140.

面。因此，国际社会可以为太平洋这部庞大而复杂的计算机再加上第二个“处理器”——中国，创建一种新型双核中央处理器，使得中美两国可以相向而行并合力协作，共同管理好太平洋这台巨型电脑。此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发展趋势所决定的，东亚国家和人民都已经分享到中国和平发展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而美国自身也与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债券、旅游、教育等领域保持着互利互惠的关系，就连美国试图建构的围堵中国的“印太地区”，也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范围高度重合，美国与这一区域内的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以对冲中国影响力的做法，也将在中国推动区域和跨区域经济对接协调的过程中被化解掉。<sup>①</sup>显然，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挑动东亚国家间的对立而阻碍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错误行径。在太平洋跨区域与中国相向而行，在政治经济关系上与东亚国家进行整体性协调，这才是美国在东亚区域的长远利益和理性的政策选择。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东南亚及其周边大国都受到严重波及，东南亚及环太平洋跨区域大国需要共同应对这一巨大挑战。东盟引领下的东亚国家在采取区域性集体行动共同抗疫和恢复经济的同时，也可用“东亚峰会”这一东南亚与周边大国协调平台，而中美两个大国更需要理性处理相互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维度中进行制度化合作，在更宽广的地域内扩展产业链和供应链建构的空间，探寻维护跨太平洋的持久安全与和平的路径。

#### 四、推动东盟与全球区域间合作网络建构

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给本已动荡不宁的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有可能导致国际秩序的重构。<sup>②</sup>东南亚与东北亚国家率先采取合作抗疫行动，并强化自身的复苏能力建设和合作机制建构，也向世界其他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伸出了援手。这正是“开放区域主义”的理念极有价值的实践。与西方国家各自为政应对疫情和美国甩锅推责形成鲜明对比，东亚国家通过跨区域和区域间合作的方式，努力使亚洲和太平洋乃至世界各国携手前行，为疫情后的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平与发展注入清新的活力。

在东盟引领下的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既要处理好与太平洋国家的关系，更需要与亚洲大陆其他区域相协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好将东亚区

---

<sup>①</sup> 苏浩：《东亚整合的艰难之路》，第419～429页；Roland Rajah, “Mobilizing the Indo-Pacific infrastructure response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Southeast Asia”, *Brookings Report*, April 2020.

<sup>②</sup> Henry A. Kissing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3, 2020.

域整合与整个亚洲大陆有机地结合，从而弥补了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缺失。<sup>①</sup>我们知道，亚洲其他区域也建立了一些多边合作机制。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于2001年主导建立的高度机制化的“上海合作组织”，其成员来自中亚核心国家，后再加上印度和巴基斯坦，聚焦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恶势力”的区域安全合作功能，现在不仅成为中亚各国的“保护神”，而且也在为“一带一路”建设铺路搭桥。<sup>②</sup>南亚则在亚洲最早建立了区域合作机制。早在1985年12月便正式召开了南亚七国首脑会议，2005年阿富汗也加入这一机制，中国则于2006年成为“观察员国”。<sup>③</sup>虽因印巴矛盾而使这一机制运行不畅，但仍是这一区域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有用平台。<sup>④</sup>中俄蒙三国自2014年后每年举行元首会晤，共同为建成一条相互联结的经济走廊，搭建了系统的次区域性的协调机制。<sup>⑤</sup>这样，东亚国家便可以通过与亚洲不同区域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战略对接，使整个亚洲粘合成为一个整体的地缘板块。《东亚整合》的作者则提出一个“四环外交”认知框架，系统分析了中国通过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中俄蒙三国协作”四个机制的联动，以东西双向为主体构架，南北联结起辅助作用，建构一个相互呼应而又环环相扣的涵盖亚洲主体部分的系统性制度合作框架。<sup>⑥</sup>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通过由内而外的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的统筹规划和开放建设，<sup>⑦</sup>作为四环联动的动脉，将整个亚洲建构为一个互联互通的制度性协作的完整大系统。

东盟引领下的东亚国家通过各区域间对接联动使亚洲聚合为一个整体的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努力推动区域间合作架构的对接与拓展，展现出一种“陆海

---

① 李向阳：《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缺位”与“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39页；张天桂：《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路径与推进策略——共建“一带一路”的视角》，《国际展望》，2018年第6期，第123~126页。

② 李自国：《“一带一路”与上合组织关系探究》，《俄罗斯学刊》，2019年第5期，第92~93页。

③ “Charter of the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http://saarc-sec.org/saarc-charter>。

④ Islamuddin Sajid, “Leaders of 8 SAARC member states to discuss strategy to stem spread of new coronavirus in region”, <https://www.aa.com.tr/en/asia-pacific/south-asian-leaders-to-meet-on-covid-19/1766633>。

⑤ 《中俄蒙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NcXY>；《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htws/Document/1491208/1491208.htm>；孙壮志：《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中俄蒙次区域合作》，《北方经济》，2018年1期，第18~21页。

⑥ 苏浩：《东亚整合的艰难之路》，第456~462页；Natalia Eremina, “Advent of a new civilization project: Eurasia in – U.S. out?”,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Vol. 7, No.2, 2016, p.162.

⑦ 罗雨泽：《统筹推进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开放导报》，2019年第1期，第21~22页。

双翼”相协作的宏大叙事体系。<sup>①</sup>《东亚整合》一书亦通过对东亚与世界其他既有区域间已搭建的对话与合作多边机制的串联式分析，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新型全球性合作网络的宏大框架。<sup>②</sup>以东亚为基点，在这一全球网络框架中可分列出三类不同地域的跨区域和区域间交流与协调机制。

第一类是与发达国家开展的区域间机制化合作，包括上文所解析的“东亚峰会”，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是由美国主导、于1989年建立的一个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机制，1993年升级为元首级别，其成员涵盖了东亚、南太平洋、南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的主要经济体，是东亚与环太平洋发达国家讨论经济协调与融合的多边平台。<sup>③</sup>“亚欧会议”是东南亚与东北亚国家作为整体与欧盟的国家领导人自1996年以来举行正式对话与交流的平台，目前南亚和中亚的国家也参与其中，通过成员国间的经济、社会、文教等领域的长期交流合作，这一机制已成为亚欧两大洲稳定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新型国际间多边对话机制。<sup>④</sup>

第二类是地跨亚洲大陆的区域间合作机制，除上文所提及的“上海合作组织”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外，还有“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和“亚洲合作对话外长会议”。“亚信峰会”的成员是亚洲主要国家，自2002年6月召开国家领导人峰会以来，通过亚洲国家在经济、文教科技、劳工等领域采取信任措施和进行相互协作，使之成为促进亚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多边合作机制。<sup>⑤</sup>“亚洲合作对话”则是由泰国倡导建立的以资源和科技为核心的亚洲国家间合作的平台，先是一个外长层级的机制，近年也提升到国家领导人层次。

第三类是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与发展中区域间合作机制，包括“亚非次区域组织会议”“亚洲中东对话”和“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亚非次区域组织会议”是由两个发展中大陆基于“万隆会议精神”于2003年建立的区域间交流与合作机制，发展中成员体在这一平台上都互为“新型战略伙伴”，而中国则将其作为“全球合作施工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⑥</sup>“亚洲中东对话”是2005年建立的

<sup>①</sup> 《王毅：两条“丝绸之路”为亚洲整体振兴插上翅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308/c70731-24573367.html>；苏浩：《多边外交展现“陆海双翼”宏大布局》，《环球》，2014年第24期。

<sup>②</sup> 苏浩：《东亚整合的艰难之路》，第434页。

<sup>③</sup> “History of APEC”，<https://www.apec.org/About-Us/About-APEC/History>；刘晨阳：《亚太经合组织30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回顾与展望》，《当代世界》，2019年11期，第4页。

<sup>④</sup> 余建华：《世纪之交以来亚欧会议合作机制评估》，《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4期，第38页。

<sup>⑤</sup> 《亚信峰会：泛亚协作构建亚洲安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1日，[http://www.cssn.cn/sf/bwsf\\_jj/201406/t20140611\\_1205703.shtml](http://www.cssn.cn/sf/bwsf_jj/201406/t20140611_1205703.shtml)。

<sup>⑥</sup> 陈向阳：《万隆精神新内涵 亚非峰会彰显中国外交“全球合作施工图”》，《人民论坛》2015年第13期，第61页。

亚洲和大中东区域国家间的外长对话机制，它注重用伊斯兰世界的视角就和平与发展问题展开对话与交流。这一机制虽因中东动荡而暂时中止，未来条件成熟时仍可再次激活。<sup>①</sup>而“东亚拉美论坛”则是2001年建成的地跨西太平洋和拉丁美洲的区域间外长级对话平台，每三年一次的对话和“三驾马车”的定期会议制，<sup>②</sup>保障了这一跨太平洋政策联动机制的稳定运行。

通过这些跨区域和区域间对话、协调与合作的机制，东盟与中日韩所构成的东亚区域与世界各大洲能够直接联结，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也都涵盖在内，世界被编织成一种制度化合作的全球网络框架。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发展中大国，还专门举办以亚洲国家为主的“博鳌亚洲论坛”、与欧盟国家间的“中欧峰会”、与非洲国家间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1+N”多边机制化会议，从而将自身融入东亚与世界各区域间的制度化合作中。

以上所描述的图景给我们认识新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启发。新冠疫情后的国际社会，某些西方国家会基于狭隘民族主义过度强调国家利益，采取收缩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逆全球化行为，其结果将导致百年来由西方所主导的平面全球化的终结。事实上，在21世纪的国际社会中，区域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作用日益显现，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布局将会以区域为导向进行重组，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趋势。<sup>③</sup>上文所分析的各种跨区域和区域间横向对话与交流机制的出现，将自然形成一种相互连接的立体性全球区域间合作网络，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个新型全球社会。<sup>④</sup>这将是一种在国家推动下的区域间良性互动的新型全球治理样式，更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可能样式。

[责任编辑：孙喜勤]

---

① 《亚洲中东对话会议各国承诺加强合作》，<http://news.cri.cn/gb/23204/2008/04/08/2625@2010901.htm>；“Thailand hosts Asia-Middle East Dialogue”，<https://forum.thaivisa.com/topic/426165-thailand-hosts-asia-middle-east-dialogue/>。

② “Overview of FEALAC”，<https://www.fealac.org/new/about/overview.jsp>。

③ Stephen Roach, “Don’t Blame Supply Chains”，<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dont-blame-supply-chains>。

④ 苏浩：《东亚整合的艰难之路》，第466～493页。